

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基于共赢观的视角

张 锋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 河南 开封 475004)

[摘要]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指引。从共赢观的视角出发, 首先阐述了共赢观的内涵与结构, 其次总结了乡村共赢观的相关研究与影响因素, 然后分析了乡村共赢观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最后提出了乡村共赢观建设的路径与对策, 以期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培育与践行共赢的价值追求, 推动乡村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关键词] 共赢观; 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 G 4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4) 04-0015-09

一、引言

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较大^[1]。乡村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短板^[2]。自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 全国各地积极行动起来促进乡村发展, 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这意味着, 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 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3]。因此, 要推动共同富裕进程, 必须实现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4], 不断缩小乡村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差距。

在本质内涵上, 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共同富裕, 也包括精神上的共同富裕, 而且精神富裕对物质富裕还具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 精神上的贫困会带来返贫风险, 影响乡村振兴的步伐^[5]。而精神上的富裕能够唤醒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提振乡村的精气神, 孕育社会的好风尚, 形成积极的价值观, 从而激发共同富裕的强大内生动力^[6]。

精神富裕的达成, 离不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价值观念的落后会导致乡村发展的落后, 使人变得更加利己、更加消极, 陷入恶性循环^[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价值诉求, 其中的“富强”蕴含着共同富裕与合作共赢的和谐发展理念。在新时代背景下, 合作共赢是我国引领世界和平发展的新方略, 也传承着我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8-10]。我国传统文化倡导合作利他的立身处世之道。如“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丈夫贵兼济, 岂独善一身”。而且, 我国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双方是处于整体系统中彼此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方的发展会带动另一方的发展, 但一方的受损也会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因此, 在乡村振兴中, 不能崇尚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应以合作化的新发展理念为指引^[11], 创建以“共赢”为价值追求的和谐发展模式, 才能进一步加快迈向共同富裕的进程。

因此, 本文从共赢观的视角, 揭示共赢观的内涵与结构, 探讨乡村共赢观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并提出乡村共赢观建设的路径与对策。

二、共赢观的内涵与结构

(一) 共赢观的内涵

共赢观是指个体在寻求自己利益时能够主动考虑并兼顾他人, 以互惠互利为基础来实现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12]。“共”是指要兼顾各方利益与共利, “赢”表示要实现各主体利益的最大化, 共赢则代表着各主体间的和谐发展^[13]。因此, 共赢的价值观是从系统观念出发, 既不能牺牲整体核心利益, 也不能忽视个体利益诉求, 从而维护共同利益与自身利益的辩证统一。

[收稿日期] 2024-05-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的时间自我对社会心态的影响研究”(18BSH112)

[作者简介] 张锋 (1976—), 男, 河南汝南人, 河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

首先,共赢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时要兼顾他人合理关切,在寻求自身发展中促进彼此共同发展。共赢追求互补互鉴、协调发展,从而达到整体的和谐统一。西方文化主张竞争与斗争,坚持丛林法则,盛行零和博弈^[14]。而共赢观则摒弃那种唯利是图的错误观念,树立“共有”“共享”“共赢”理念,促使不同主体由单一的利益追求走向双赢、多赢、共赢^[15]。

其次,共赢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义利观。儒家的义利观具有明显的重义轻利的特征,但并不否定利,强调必须通过正当手段来获利,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9]。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非洲时首次提出正确义利观,强调义利相兼、以义为先,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做唯利是图的狭隘之举,最终实现合作共赢。因此,“利”是自利、互利、共利的实现,这恰恰是一种道义表现和价值取向^[16]。所以,各利益相关方要正确处理义利关系,最终达成互利共赢。

最后,共赢观有助于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具体内容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兼顾了国家、社会、公民个人三个层面的美好愿景与价值目标,是社会主义根本的价值原则,从价值层面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当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世界多极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相互依存,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在2018年7月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习近平提出了顺应时代潮流、实现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第一点就是强调“坚持合作共赢,建设开放经济”。不同国家要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才能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共同繁荣。因此,共赢观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助推乡村经济更好更快地得到健康发展。

(二) 共赢观的思想渊源

1. 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和”思想与“大同”理念。“中和”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导精神。《中庸》强调“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大同”理念最早出现在《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近代康有为《大同书》也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可以看出,“中和”思想与“大同”理念均蕴含着共生共存、共进共荣的共赢观。

2. 我国传统文化注重事物的关联性,强调协调与合作。和谐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17]。在思想体系的层次上,追求和谐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18]。我国道家文化强调阴阳转化、阴阳消长、阴阳平衡,体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性。“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一根火柴难起火,单门独户困难多”“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灵活轻巧的双手,离不开彼此团结的十指”“同心山成玉,协力土变金”“人心齐,泰山移”均从不同角度说明了协作的重要性与合作的力量。因此,只有相互谦让、相互帮助,注重沟通联系,才能达到共赢的和谐局面。

3. 我国传统文化倡导互补互鉴与共同发展。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来自异质文化间的互补互鉴与吸收^[19]。“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能闭门造车、孤芳自赏,应有见贤思齐、海纳百川的精神。而且,我国传统文化强调“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力求在此基础上达到“聚同化异”。求同存异与聚同化异虽然都尊重差异性,但求同存异是保留差异并搁置起来,而聚同化异则是把差异减小,以至化解。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大融合以及中西文化的互补交融等都展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倡导的交流互鉴与共同发展的智慧与力量。

4.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有机结合的重要组成部分^[20],从整体利益出发,强调以共同利益为前提,承认与尊重各方的差异,在争取自身利益时不损害他人利益^[9]。此外,该理论从唯物主义出发,以增强政治互信、发展经济互惠、合作机制建设为途径,以民主、多样、共赢合作为属性,致力于建立民主、多样、共赢的国际合作^[21]。

5. 博弈论。博弈是人类最古老的社会活动之一。博弈论是研究相互依赖条件下实现最优决策的一门科学，又称对策论。合作博弈理论强调团体理性，而非合作博弈理论注重个人理性，主要探讨在利益相互影响的情形中如何使自己收益最大化。在囚徒困境博弈中，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者的结果是最差的。而合作是有利的“利己策略”，进行合作才能互利共赢^[22-23]。可以看出，博弈过程只有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和合包容，才能互利多赢。因此，“共赢”博弈是双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获赢，而不是零和博弈所导致的一方赢而另一方输的结局。

（三）共赢观的结构

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和聚类分析的方法，研究者揭示了公众的共赢观的心理结构与成分^[24]。结果发现，共赢观分为诚信性、利他性、先进性、协同性与和谐性5个维度。具体来说，诚信性侧重于诚实守信，利他性是指从他人利益视角而行动，先进性意味着共赢者要追求卓越与进步，协同性注重整体意识和合作精神，和谐性强调相互尊重与彼此包容。在五维结构模型的基础上，研究者还编制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共赢观量表^[12]。

5个维度密切关联而共同构成共赢观。第一，诚信性是共赢观的基础。诚信是人际交往的重要纽带^[25]，奠定了合作共赢的基石。第二，利他性是共赢观的前提。利他性的核心是换位思考，不仅要关注自身，还要考虑他人，实现共同发展。利他是集体主义的本质特征，强调“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利主义交往理性^[26]。只有对他人有利的合作才具有可持续性，最终达成共赢。第三，先进性是共赢观的动力。先进性体现了为寻求进一步发展而展现出来的积极进取心，是个体奋发有为、担当作为而谋发展的强大驱动力量，推动个体不断创新学习并在互利共赢中快速成长。第四，协同性是共赢观的机制。协同性强调整体意识与合作精神。只有加强协作，强化配合，同心同德，同频共振，形成合力，才能相得益彰并促成共赢。第五，和谐性是共赢观的核心。阴阳和谐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27]。和谐性不是基于线性的“输赢”思维模式，也不意味着盲目地避免冲突，而是注重统一与共存，相互尊重与包容，达成多赢而实现和谐发展。

三、乡村共赢观的相关研究与影响因素

（一）乡村共赢观的研究现状

虽然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共赢观思想，但是我国乡村共赢观的研究才刚起步，取得的相关研究成果还不够丰富。目前，综观国内现有研究，可以发现其主要表现为三个特点。

1. 研究较多针对共赢而较少聚焦于乡村共赢观。在中国知网以“共赢”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从2000年以来有近1100篇文献，以“双赢”为关键词的文献有1400余篇，以“多赢”为关键词的文献有80多篇。但是，以“乡村+共赢”“乡村+双赢”“乡村+多赢”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较少。可以看出，对乡村共赢观进行研究的直接文献资料十分有限。

2. 研究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缺乏心理学与教育学研究。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尽管已有研究对共赢观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多数研究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领域，其研究主题主要与企业管理、经济发展、校企合作等方面有关，从心理学与教育学的角度进行乡村共赢观的研究比较缺乏。

3. 理论思辨和分析研究居多，实证研究相对较少。在现有研究文献中，有关共赢观的理论思辨和分析研究占据较大比例，采用问卷调查法、深度访谈法、实验法等研究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的实证研究较少。未来应加强乡村共赢观的实证研究，并把定量研究方法和质性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探讨。

（二）乡村共赢观的心理学研究

目前，尽管国内学者对乡村共赢观的直接研究非常有限，但与共赢观有关的心理学研究却取得了一些进展，主要涉及中庸心理、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亲社会行为、社区共赢观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1. 中庸心理研究。有研究者在1997年最早提出了中庸的心理学概念，并将中庸建构为一套实践思维体系，也就是指人们在处理日常生活事件时用以决定要如何选择、执行和修正具体行动方案的指导方针，而且以8个具有中庸特色的基本原则（顾全大局、不走极端、恰如其分、以和为贵、注重后果、合情合理、两极感知、天人合一）为理论框架，编制了包括16题的中庸量表^[28]。后来，

研究者还对中庸信念/价值量表的计分方法的优化与完善进行了实证探讨^[29]。

杨中芳对我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概念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中庸”思想在现代中国人的做人处事中占有重要地位^[30]。现有研究发现,中庸价值观与社会适应^[31]、抑郁症状^[32]、情绪调节^[33]、宽恕倾向^[34]、家庭功能和心理健康^[35]等关系密切,并在工作负荷与工作——家庭促进的关系中起到缓冲的调节作用^[36]。

2. 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研究。思维方式(thinking style)是指人们在看待和思考问题时的一种基本倾向。它反映个体处理问题的方式,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37-38]。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整体性的(holistic):一是善于用辩证(dialectics)的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如,中和论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适度的合理性;二是强调看问题时的整体性(entity),强调事物之间的关系和联系。但是,与中国人的辩证思维不同,西方人更相信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思维,即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美国人倾向于用分析式(analytic)的方式处理问题,强调事物自身特性,使用分类等方法把一个事物从它所处的背景中分离出来。

侯玉波等采取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以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观念为理论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深入探究了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结构,并在此基础上编制出了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通过对2 859名被试数据的分析,总结出了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的三维结构:联系性、变化性和矛盾性^[39]。

3. 亲社会行为研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中,关于共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信任、合作等亲社会行为方面,并有研究者开发了信任量表、青少年亲社会行为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合作和竞争人格倾向量表等相关的测量工具。

亲社会性的反思模型(reflective model of prosociality)认为,人类生来就是具有非道德的和纯粹利己主义倾向的生物。亲社会行为则需要对这种利己本能进行反思性控制^[40-41]。信任是指个体对他人的言语、行动和决定有信心,并愿意为之行动^[42],这对于建立和维持关系以及有效合作至关重要。合作是指社区成员形成的互利关系和过程,通过共担风险、共享资源、共担责任与共享利益的方式,提高其他伙伴的能力以实现共同目的^[43]。一般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变得更加倾向于

合作。这可能是因为从经验中获知:从长远来看,欺骗行为在许多环境中都是一种失败的策略,诚实合作才是一种可取的策略。相较于相互背叛,互相合作会使每个人都得到更有利的结果^[44]。

4. 社区共赢观研究。研究者通过聚类分析的方式,对社区共赢观进行了调查研究^[24]。首先,研究者在137名参与者(77名女性,60名男性)中进行了开放式问卷调查。然后,研究者对332名参与者(187名女性,145名男性)进行了共赢观特征词问卷调查,获得了29个共赢观的特征词,其中排名前10项的特征词分别是:诚实、尊重他人、有全局意识、有团队精神、乐于与他人合作、追求共同利益、理解他人、善于换位思考、善于倾听以及善于与他人沟通交流。聚类分析结果表明,这29个特征词可以分为五类:具有团队精神、乐于与人团结合作、具有全局意识、追求彼此间共同利益以及与他人能达成共识(协同性);待人友善、心态积极乐观、待人宽容大度、追求和谐而不偏激、善于倾听以及能够尊重他人(和谐性);处事灵活而高效、有见识、具有创新精神、自信心强、能力素质高以及规则意识强(先进性);乐于付出与奉献、与他人能互惠互利、善于与人沟通交流、乐于支持他人、善于换位思考以及理解体谅他人(利他性);理性、正直公平、待人真诚、讲诚信、务实以及平等公正(诚信性)。因此,社区共赢观涉及诚信性、先进性、利他性、和谐性以及协同性5个因素结构。

而且,社区共赢观的聚类分析结果也得到了另一项实证研究的支持。首先,该研究通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等步骤,形成了包括25个项目的共赢观量表。然后,以另一组样本数据进行了一阶模型和二阶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并根据修正指数和拟合度指标删除了9个项目,最终保留16个项目。总之,该研究结果说明,共赢观的五维结构模型(诚信性、先进性、利他性、和谐性、协同性)是合理可靠的,且量表的信度与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标准^[12]。

此外,研究者还探讨了共赢观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共赢观之间呈显著正相关,社会经济地位对共赢观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而且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积极未来自我的中介效应对共赢观具有显著的间接作用^[45]。此外,另一项研究结果还发现,童年忽视和自我连续性在

社会经济地位对共赢观的影响中起着多重中介作用^[46]。

（三）乡村共赢观的影响因素

1. 外部因素。乡村共赢观的外部影响因素较多，如乡村环境、乡村治理体制等。

首先，乡村环境。乡村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等。环境既包括基础设施等“硬”环境，也包含乡村文化等“软”环境。

乡村共赢观的形成有赖于乡村基础设施和乡村服务功能的完善。加强乡村基础设施（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等生活设施和休闲健身场地与器材等）的建设和乡村物质与精神方面服务的投入，不仅可以为村民提供安全、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而且能够增进人际交往，密切邻里关系，增强乡村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乡村共赢价值观的形成。

乡村文化是指在乡村聚居生活的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共同形成的精神共识和相应的物质形态，其本质是一种家园文化^[47]。村民通过参与乡村文化活动，能够不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沟通和联系，建立起和谐、友善和互助的人际关系，广大村民也能够对自己生活的乡村产生感情，增强自豪感，并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归属感。而且，村民归属感越强，就越具有奉献意识。因此，和谐文明的乡村文化能够引导和约束村民的思想和行为，使之形成乡村共赢的价值目标，并通过多样化的文化内容和载体使共赢观扎根乡村，充分展示其价值导向的功能。

其次，乡村治理体制。乡村治理体制对共赢观具有重要的影响。乡村治理不是一整套固定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相互协调的过程；治理过程不是建立在控制之上，而是协调；治理不仅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48]。因此，最佳的乡村治理体制并不是单一化的乡村管理过程，而是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到乡村管理的过程。

在乡村治理中，各方联动、全员参与、共同建设的多元化治理体系有利于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人人参与”的格局，从而使共赢的价值理念内化于心并外化于行。此外，乡村治理的激励机制、利益调节与导向机制、法律约束机制与道德约束机制也影响着共赢观的形成。

2. 内部因素。乡村共赢观的内部影响因素涉及面较广，如村民思维模式、乡村社区感等。

第一，村民思维模式。在市场经济中，各个主体倾向于以“赢”作为追求的目标。实际上，“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思维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思维都是一种典型的极端思维模式，也是一种非合作的狭隘思维模式。这都属于唯利是图的利益诉求方式，其最终结果是损人并不利己，直至两败俱伤。

“共赢”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对问题的整体性思考方式，其目标是你赢我也赢。这就需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努力做到“共赢”。作为具有共同利益的村民，合作才是符合其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因此，“你死我活”的思维模式不利于乡村的和谐发展，需要树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思维模式，力求共存、共荣、共赢。

第二，乡村社区感。乡村社区感反映了村民对乡村社区的认可和接纳程度，以及村民与乡村社区之间的情感联结强度。因此，乡村社区感是可以把村民联结起来的强大内部力量^[49]。乡村社区感既有对自己乡村社区身份的确认，也带有个体的感情色彩，主要包括社区认同、社区氛围和社区归属等方面。

乡村社区感与社区参与、邻里信任、人际互动等密切相关。乡村社区感不仅能够激发村民的责任意识、公共意识、参与意识与奉献意识，还能够统一村民的思想和行动，凝聚文明、和谐、向上的正能量，弘扬“崇善、包容、互助、和谐”的精神。乡村社区感较高的村民能够积极投身乡村社区事务，时时事事考虑公共利益，共筑社区命运共同体，从而形成并坚守共赢的价值理念。

四、乡村共赢观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一）个人利益与乡村集体利益的冲突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乡村居民在市场化背景下倾向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时常发生一些冲突，有时甚至不惜损害公共利益，走向无视他人、与集体利益的极端个人主义，只追求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这与互利共赢的价值目标是背道而驰的。

在乡村社区中，尽管各主体都在为实现公共

利益和共同目标而进行各种活动,但这也是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博弈的过程,是在保护自身利益的基础上追求公共利益,这与城市社区是类似的^[50]。由于一些村民更多关注自身利益和自身需求的满足,甚至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较少考虑乡村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未能在参与主体间寻找到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最佳契合点与最大公约数,进而引发个人利益与乡村集体利益的冲突与矛盾,这给乡村振兴中的共赢观建设带来了严峻挑战。

(二) 乡村人际信任的缺失

人际信任是维系乡村和谐与稳定的纽带,也是实现共赢的基础与条件。而人际信任的缺失,则会破坏交往关系,给双方造成伤害,更谈不上合作共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利益格局发生调整,社会变迁和社会流动性加大,有些村民缺乏内在的规范力量,存在侥幸心理,导致“杀熟”行为的出现。而缺乏心理安全感导致人人“自卫”,处处设防,谁也不信任谁,甚至相互欺诈,社会交往成本急剧增加,以关系规范为约束力量的人际信任模式受到巨大冲击^[51],甚至有小朋友被师长告诫“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陷入“只相信自己,绝对不相信别人”的怪圈,人际不信任风气在乡村蔓延。这些现象都折射出人际信任危机的问题,对共赢观的建设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三) 乡村治理的体制机制有待优化

乡村管理向乡村治理的转变体现了我国现代治理体制的新转向,即治理形态向扁平化、治理机制向法治化、治理方式向多元共治转变。目前,尽管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已成为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势,但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仍有待完善。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村民习惯于传统的政府自上而下的“全能型”管理模式,这种依赖心理导致其在乡村治理中缺乏参与热情。此外,有些政府主体存在“越位”现象,将原本属于政府职责范围的一些事务下派给村委,不再以服务村民为出发点,出现了过度行政化的倾向。因此,与城市社区治理困境类似^[50],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不同治理主体也存在着互动不足、沟通缺失、彼此牵制而造成紧张状态的现象,这严重降低了协同治理的效能。如果不同主体不能有机结合并形成强大合力,不能通过平等对话和有效协

商寻求最佳利益契合点,就无法拥有一种旨在协同治理的互动协作关系^[52],乡村治理的共赢目标也难以实现。

五、乡村共赢观建设的路径与对策

(一)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利他合作的责任意识

培育与践行共赢观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在乡村振兴中,虽然“经济人”价值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发展,但这种自利观念以“经济至上”为主,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可以引导与规范经济行为^[53],倡导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有助于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冲突,从而实现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共赢目标。

利他合作的责任意识继承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强调了先公后私和先人后己的利他精神,体现了一种有责任心与担当的取舍之道。在乡村振兴中,如果没有积极正向的价值观,个体也难以有积极正向的内生动力^[54]。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共赢观分别与社会经济地位与积极未来自我呈显著正相关^[45]。因此,坚持协同合作,多做有益于他人和乡村发展的事情,愿意为公共事务做出贡献和牺牲,村民就容易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赢观。这必将有力推进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促使乡村发展快步迈向共同富裕之路。

(二) 弘扬诚信文化,推进诚信乡村建设

信任是人与人进行交往合作的基础。人际信任危机则造成人们之间互不信任且彼此相互提防,相应的交流和合作就变得更加困难,对他人的关心和帮助也变得难以实现,还会影响乡村的和谐稳定^[55]。重建人际信任离不开优秀文化的熏陶,因此要弘扬诚信文化,营造乡村信任的环境与氛围。

根据社会学习理论,可以通过树立诚信典型来推进诚信乡村建设。乡村可以举办“诚信之星”“诚信家庭”等评比宣传活动,鼓励村民积极参

与，近距离真实接触诚信楷模，激发村民内心对诚信美德的认同，增强人际间的信任，并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乡村振兴^[34]，从而为共赢观的形成奠定坚实基础。

（三）构建命运共同体，健全共赢治理体系

首先，通过树立牢固的乡村认同和归属感来构建乡村命运共同体。通过开展多种活动增加交往频率，建立熟人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还可以通过参与公共议题找到利益共同点，引导村民关心和参与公共事务。由家人变为主人，做到彼此能够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溢效应，逐步形成共存共荣、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其次，采用欣赏型探究（*appreciative inquiry*）的积极方式，建设和扩展乡村居民的合作能力。传统的聚焦诊断与问题解决的乡村建设模式，始终把乡村不良问题的探寻与改善放在中心地位，即发现问题，探讨原因，提出补救措施或整治方案。欣赏型探究是从以优势为本（*strength-based*）的视角，致力于挖掘促使乡村从普通走向卓越的内在动力。因此，乡村治理就成为一个阐发和拓展社区优势的过程。这通常与合作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升乡村居民的合作能力。乡村居民对社区抱有积极的肯定性的信念具有重要作用。典型的欣赏型探究将关心的问题重构为一种以肯定性语言表述的机会^[56]。如原有的“问题”（改进乡村卫生问题）可以转变为肯定性话题（为维护乡村居民健康而共同努力），这可以促使乡村居民更好地理解、构想和实现更多的未来可能性。这使他们为了共同目标或梦想而探寻新的合作方式，从而构建并维系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形成社区共赢的价值观与文化体系。

最后，要优化治理结构，形成协作共赢的现代乡村治理模式。如，乡村可以形成以“多元主体、多元平台、多元服务”为基本架构的多元共治的治理体系^[57]，或建立以政府为主导、村民为主体、市场与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机制^[52]，还可以积极探索软治理模式，借助文化、价值观、道德、信仰、制度规训等柔和手段进行治理^[58]，把硬治理与软治理有机结合起来。

六、结束语

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目标指引，共赢观推动乡村在高质

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要积极培育与践行共赢的价值追求，充分发挥共赢观的引领作用，从而更好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实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 [1] 周文，刘少阳. 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历史变迁、问题与改革深化 [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7）：47-59.
- [2] 黄承伟. 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及理论议题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6）：1-9.
- [3] 习近平.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J]. 求是，2021（20）：4-8.
- [4] 高越风，陈沛绅. 论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 [J]. 领导科学论坛，2022（1）：70-73.
- [5] 张庆，达娃玉珍. 西藏乡村精神贫困现状与帮扶——基于99个乡村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J]. 西藏发展论坛，2021（6）：54-58.
- [6] 欧健. 共同富裕：历史方位、现实图景与实现机制 [J]. 河南社会科学，2022（1）：1-13.
- [7] 周伟. 乡村振兴视阈下农民精神贫困问题及化解路径 [J]. 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3-42.
- [8] 张立文.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3）：2-8.
- [9] 王睿腾. 习近平合作共赢理念的传统文化内涵 [J]. 学理论，2019（11）：7-9.
- [1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理论中心组. 坚持和平发展 促进合作共赢 [J]. 求是，2013（18）：22-24.
- [11] 廖维晓.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合作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河南社会科学，2022（4）：35-45.
- [12] ZHANG S, ZANG X, ZHANG F.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Win-win Scale [J].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1（657）：1-10.
- [13] 黄希庭. 社区心理学导论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1：73.
- [14] 朱相远. 从“零和”博弈到互利共赢——东西方文化融合的新共识 [J]. 北京观察，2012（4）：70-71.
- [15] 张春雨. 共赢思维的辩证法渊源及其现实意义 [J]. 科技信息（科技教育版），2006（10）：207-208.
- [16] 李德周，杜捷. “共赢”——一种全球化进程中的建设性思维方式 [J]. 人文杂志，2002（5）：140-147.
- [17] 张岱年，程宜山.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M]. 北

- 京：中国大学出版社，1990：71.
- [18] 黄囡莉. 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 [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26.
- [19] 周东娜. 我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发展及其当代启示 [J]. 理论学刊，2014（12）：114-120.
- [20] 韦仲曦. 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渊源、形成及发展 [D]. 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9.
- [21] 刘传春. 马克思主义国际合作思想：演进与逻辑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29.
- [22] 张建英. 博弈论的发展及其在现实中的应用 [J]. 理论探索，2005（2）：36-37.
- [23] 张永胜. 互利共赢的博弈论分析 [J]. 理论月刊，2008（12）：41-44.
- [24] 张锋，张杉. 公众共赢观的结构探索 [J]. 社区心理学研究，2020（2）：113-124.
- [25] 张帆，钟年. 我国人的信任与生命史策略 [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017（2）：44-61.
- [26] 邵士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集体主义研究 [D].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5.
- [27] 李宝玉. 《易经》阴阳和谐思想及其评价 [J]. 求索，2008（6）：57-59.
- [28] 杨中芳. 中庸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构念化 [A] // 杨宜音，杨中芳，韦庆旺.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七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17.
- [29] 徐慧金，邹智敏. 反中庸，还是非中庸？检验中庸信念/价值量表反向计分的有效性 [A] // 杨宜音，杨中芳，韦庆旺.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七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43-58.
- [30] 杨中芳. 传统文化与社会学结合之实例：中庸的社会心理学研究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3）：53-60.
- [31] 谭冬雪，黄敏儿. 中庸思维与社会适应：情绪调节的中介作用 [C]. 第十五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广州，2012.
- [32] 高瞻，蔡华玲，唐淦琦，等. 中庸思维与抑郁症状之关系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3（9）：1298-1300.
- [33] 郭侃，曾维希. 大学生中庸思维在情绪调节和情绪间的作用 [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7）：1101-1103.
- [34] 郑淇，薛花，吕美祯，等. 大学生中庸思维与宽恕倾向的相关研究 [J]. 校园心理，2014（4）：219-222.
- [35] 阳中华. 中庸实践思维与家庭功能和心理健康关系研究 [D]. 长沙：中南大学，2012.
- [36] 李原. 工作压力因素对工作-家庭平衡的影响：中庸的调节作用 [A] // 杨宜音，杨中芳，韦庆旺.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七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7-191.
- [37] 侯玉波，田林. 文化心理学的思路与范畴 [J]. 社会心理研究，2001（1）：35-40.
- [38] 侯玉波，朱滢. 文化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影响 [J]. 心理学报，2002（34）：106-111.
- [39] 侯玉波，彭凯平，朱滢. 中国人整体思维方式量表的编制与确认 [J].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1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5-72.
- [40] METCALFE J, MISCHER W. A hot/cool-system analysis of delay of gratification: Dynamics of willpower [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9（1）：3-19.
- [41] STEVENS J R, HAUSER M D. Why be nice? Psychological constraints o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 [J].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04（2）：60-65.
- [42] MCALLISTER D J. Affect- and cognition-based trust as foundations for interpersonal cooperation in organization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5（1）：24-59.
- [43] 维多利亚·C. 斯科特，苏珊·M. 沃尔夫. 社区心理学实践基础 [M]. 张锋，王红波，邢小莉，译. 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69.
- [44] BALLIET D, VAN LANGE P A M. Trust,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A meta-analysis [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3（5）：1090-1112.
- [45] 张锋，张杉. 共赢观与社会经济地位、积极未来自我 [J]. 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6）：13-19.
- [46] ZHANG F, ZHANG S, GAO X.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win-win values: Mediating roles of childhood neglect and self-continuity [J]. Frontiers in Psychiatry, 2022（882933）：1-7.
- [47] 高淑慧. 大力推进社区文化建设的意义与措施 [J]. 传媒论坛，2018（17）：165-167.
- [48] 俞可平. 全球化：全球治理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41.
- [49] 詹姆斯·H·道尔顿，毛瑞斯·J·伊莱亚斯，阿伯汉姆·万德斯曼. 社区心理学：联结个体和社区（第2版）[M]. 王广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13.
- [50] 赖金茂. 基于多元协同的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J]. 黑河学刊，2019（2）：8-11.
- [51] 魏振英. 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下的人际信任重构 [J]. 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17（6）：58-60.
- [52] 高强，曾恒源，殷婧钰. 新时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研究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01-110.
- [53] 曹立，石以涛. 乡村文化振兴内涵及其价值探析

- [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6): 111-118.
- [54] 傅安国, 张再生, 郑剑虹, 等. 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 [J]. 心理学报, 2020 (1): 66-80.
- [55] 宋艳峰, 王铮芳. 人际信任的缺失与重建 [J]. 教育教学论坛, 2011 (31): 221-222.
- [56] 弗兰克·约瑟夫·巴雷特, 罗纳德·尤金·弗莱. 欣赏型探究：一种建设合作能力的积极方式 [M]. 张新平,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 117.
- [57] 张文. “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模式 [N]. 学习时报, 2014-9-15 (A11).
- [58] 万坤利. 乡村软治理生成的动力机制研究 [J]. 贵州社会科学, 2021 (7): 162-168.
- (责任编辑: 孙永泰)

Rural 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f Win-win Values

ZHANG Feng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Rural vitalization is a vital way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and common prosperity is a guiding goal of rural 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in-win values, firstly the connotation and structure of win-win values were expounded. Next, the related research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win-win values were summarized. Then,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exis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win-win values were analyzed. Finally, the way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win-win values were proposed, with the hope of cultivating and practicing the value pursuit of win-win and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rur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win-win values; rural 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